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自我、主体性 与文化交流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张庆熊 ● 著

Zhang Qingxiong Zhu



Zhang Qingxiong Zhu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自我、主体际性 与文化交流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张庆熊 ● 著

责任编辑 杨承纭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

张庆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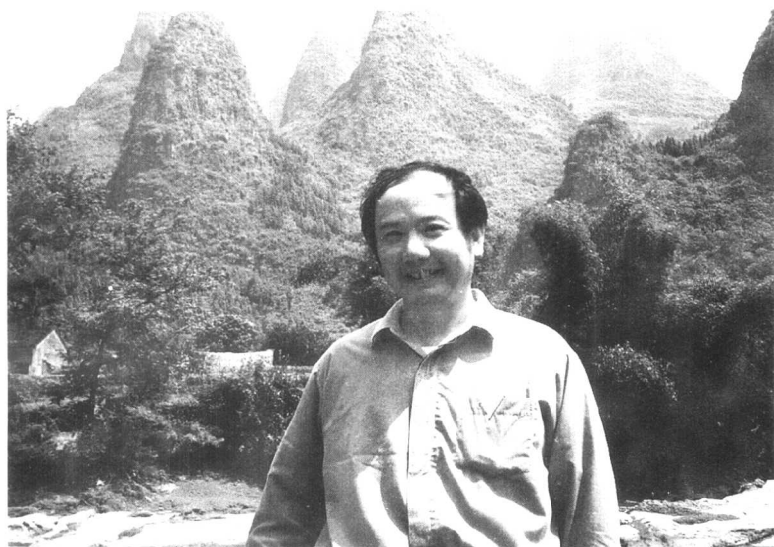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6 字数 167,000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3096-0/B·260

定价 16.00 元



作者近影

作者简介

张庆熊，汉族，1950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7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1976至1979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班，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至1993年在瑞士留学与工作，获瑞士弗兰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间发表专著一本《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德文）及论文多篇。现为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噫”！人以此一音而化入其“自我”矣！
诚然！此也，大奥义书之教也！诸天之密义也！

——《五十奥义书》

总 序

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虽仍困难重重，问题重重，但一个蓬勃向上的中国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希望使人激动与兴奋；困难又使人焦虑与迷惘。在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迫切需要智慧的思想——哲学，这是历史对处于命运转折点的当代中国人提出的时代要求。

的确，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崇尚实利的思潮，在此情势下，似乎没什么比谈论哲学更不合时宜了。但是，每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它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思考，它指引人类理智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趋向的目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哲学的民族更是注定不会有远大的前途。王国维讲，哲学是“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正是指明了这一点。一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能没有，也迫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哲学家为之深思和前瞻；崛起的中华民族，应该再次给人类提供自己的智

慧和思想。我们生活的时代,正由“国际化”向“全球化”发展。我们不仅面临自己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人类的共同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现代科技和经济制度第一次向人类展示了永久摆脱贫困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人类在其精神生活和价值体系上从未像现在这么不定和迷惘。各种社会冲突乃至战乱不断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进入下一个一千年?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思想,需要智慧,一句话,需要哲学。不错,哲学从未像现在这么衰落,但哲学自我更新的契机也正在这似乎黯淡的现实状况中。“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的出现,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一般状况、一般条件和前景的困惑和疑问。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历史时刻,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有新的思想去思考、探索、研究和总结。这种历史要求证明中国哲学已经具备自我更新的外部条件。然而,哲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不断创新是哲学的动力与生命。“哲学”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的原义是“爱智之学”。哲学追求的不是平庸空洞的抽象构造或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是启人心魂的智慧创造。这也是人们对哲学的最大期待。中国哲学的前途在于有原创性的思想。因此,我们期待,也努力促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开拓新路的著作不断问世。

新的历史条件不仅要求哲学有新的思路,也要求它更加直面生活,直面世界及其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哲学不应该有自己的问题。历史上哲学的重大问题无不来自哲学家对现实问

题的思考。当哲学家将这些问题上升到理论和哲学层次时,就更突出了它们的基本性和重要性。无论是历史条件还是哲学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哲学家,尤其是一流哲学家,将眼光放在那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上,放在有远大发展前景的理论与方法上,放在已成为人类宝贵精神资源的伟大思想上。

必须承认,与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是相对落后的。这表现在像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等专门哲学门类在中国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专著,即使是专门的研究论文也不多见。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离国际水准和规模还有不小的距离。逐步建立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不仅对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而且,对于将中国哲学研究提高到国际水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希望能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哲学探讨的是关于人类存在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与方法有相当高的普遍性,哲学思想的任何成果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哲学首先是哲学,然后才有传统、立场、学说、倾向和内容等等区别。无论是中西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是哲学,就应有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区别只在于这些问题的提出、理解和回答上。因此,沟通各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对于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来说就尤其显得重要。成熟的中国哲学只能在融会贯通了各种不同哲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产生。正如王国维早就指出的:“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当代中国哲学只有在与世界哲学积极对话交流中才能形

成自己的特色。这就要求中国哲学家同样能研究国际哲学界关心的一般和前沿的哲学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当代中国哲学应该在未来的世界哲学中占有它应有的地位。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著作具有国际公认的专业性和学术规范性。这也是本丛书给自己提出的基本要求。

我们深信,中华民族将充满着智慧进入下一世纪。生机勃勃的当代中国哲学将向世人证明我们是一个睿智的民族,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

谨序。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编委会

序

在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通过文化比较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探讨通过文化交流实现她的创造性转化,以期她在现时代重放光彩,是本书写作的主旨。

在研究文化问题的时候,常陷于以下两种观点之间的循环:一种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把文化说成是人的本性的外化;另一种是从既成的文化出发,把人性说成是由文化塑造的。如果从人的本性出发,势必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人有没有固有的本性?如果肯定人有固有的本性,接下来的问题就很难回答:你如何知道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相同的吗?如果人的本性相同,文化又是人的本性的外化,那么为什么文化是多种多样和不断发展的?反过来,如果把人性说成是由文化塑造的,我们也会遇到令人困惑的问题:难道文化不是由人创造的吗?难道人的主观的愿望、意志、理想和价值观不是在文化的创造中发挥作用吗?中国哲学从先秦起就讨论性本善或本恶的问题,不论是性本善论者还是性本恶论者又都不得不把人性问题与社会的环境和教化的问题相联系,前者要用社会环境的

恶说明性本善的人为什么会变恶,后者要用教化来说明性本恶的人为什么会变善。我们很难评价这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因为他们都没有说明人的本性是如何被认识的问题。

作者在思考人的主体与文化的关系的时候,不想重走这条老路。所以,换一种提问的方式,不提问人的本性与文化的关系,而提问自我与文化的关系,试从自我和主体际的关系出发研究文化。作者主张,文化的结构是主体际的结构,文化交流的关系是主体际交流的关系,自我是该结构的基本要素。尽管自我也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但是“自我”这个概念要比“本性”这个概念清楚,是一个较为有利的切入点。我们较有把握回答:我们是怎样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史上,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作为一条自明的原理。胡塞尔通过现象学的方法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自我意识的自明性的问题。米德等哲学家又指出对自我的意识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意识的基础上的。维特根斯坦论证脱离了语言游戏及生活形式就没有内在意识的自明性的落脚处。哈贝马斯把交流的理性和目的理性提到理性的最重要的位置上,并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寄托在通过文化交流和对话达成理性的共识的基础上。

这似乎又陷入了一个循环:为要说明文化,要从自我开始,为要说明自我,又要从文化开始。但是,这是在不同的更高层次上的循环,通过这个循环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首先,西方近现代哲学史的发展表明,尽管对自我的意识要比对本性的意识清楚得多,每个人在神志清醒时似乎都确切地知道自己自己的那个自我的存在,但是在纯粹的内在意识中寻求自我意识的自明性并以此建立哲学体系的阿基米德点的做法仍然

是行不通的。其次,我们看来应接受这样的观点:自我是主体际的自我,是在生活世界中的自我;语言不仅起描述世界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起主体际交流的作用;理性不能被简化为工具的理性,它更主要是起主体际的交流和认识人类群体的共同目的的作用。自我的主观能动性要在主体际交流的共同体中获得发挥。但是群体不应压抑个体,文化不应束缚人的个性的发展,建立一个使思想得以自由交流和政治上光明磊落的民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理想。

可以坦率地承认,本书所用的研究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来自西方,本书基本上属于从西方思想的视角研究和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类别。作者的专长是胡塞尔现象学和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在本书中较为详尽地讨论了胡塞尔关于自我、主体际性和生活世界的理论,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与生活形式的关系的论述。此外本书还涉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罗伊斯、米德、哈贝马斯、罗蒂的有关学说。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不是对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人作专题研究或比较的著作,只是抽取他们中有关自我、主体际性和文化交流的论述,进行讨论,以期获得研究文化现象和进行文化比较的方法。

但是本书的基本精神是与中国历史上从孔夫子到熊十力的大儒的哲理相通的。孔子说的“仁”不是脱离主体际的关系的,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就当时而言,是在夫妇、父子、君臣、国家和民众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熊十力讲“体用”,本体或本心是大用流行,是生生化化不息的生命之流,是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人认识本心要通过

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我认为中国儒家说的作为本体的仁与西方哲学中讲的交流的和目的的理性并无二致,因为他们都强调要在人类主体际的交流和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实现“爱”的理想。

作者不敢苟同当代中国的某些哲学家把中国儒家哲学归入道德本体论的说法。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儒家追求的是人原初的和纯粹的仁的本性,并要从这种原初的和纯粹的“仁”或“内圣”中开辟出民富邦安的“外王”,在近现代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内圣的中国儒学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外王。我以为这陷入了一个误区,因为这种所谓的原初的和纯粹的仁超离了一切关系和现实性,所以它是空洞的、无法实现的。西方近代的民主是随着西方近代市民阶级的兴起和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的社会关系中起的主导作用而形成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在一系列人与自然、人与人、观念与观念的变革关系中实现的,这包括观测事实与理论的关系,逻辑和数学的观念与观念间的关系,科学实验与生产的关系,等等。企图从道德伦理的空洞原理或人的纯粹本性出发,开辟出科学技术的繁荣和政治的民主,是脱离现实关系的闭门造车,永远不会有结果。所以,本书在探讨如何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时候有意避开这样一个引人误入歧途的假问题。本书在比较中西文化的时候不是从空洞的原理出发,而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把生活世界视为科学世界和哲学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在第一部分中评述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有关自我和主体际性的学说,希望先把文化的基本要

素和结构关系弄清楚。然后在第二部分评述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交流的基础和方法。这两个部分各三章,共六章。本书第三部分含五章,是用前两部分提供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比较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特征、区别和联系,探讨中国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本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十二章是结束语,对全书的观点作提纲挈领的总结。

本书的大部分稿子写于近二、三年,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我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的,它也不会随着本书的结束而结束。可以说,自从我在15年前(即1983年)走出国门在欧洲留学的时候起,我就开始考虑东西文化比较的问题。那时我总觉得自己不由自主地用中国的眼光看西方,小到商品的价格,大到哲学的观念和政治的体制,我都要把它们先转换到中国的坐标系中才能理解。5年前(即1993年)当我在欧洲生活了整整10年之后回到中国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总是用西方的眼光看中国,久而久之才把坐标系转换过来。本书谈的是哲学理论的问题,但在这背后确实凝聚着我十多年来体尝中西文化的许许多多生活经验。如果我有写小说的才能的话,真该利用这些素材。

除此之外,本书的成稿还得益于近5年来我参加的许多学术讨论会。我非常感谢麦克林(G. F. Mclean)和恩德利(G. Enderle)组织发起的国际价值学会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多次研讨会;我也很感谢倪梁康、张灿辉、张汝伦、张志扬等人轮流主持举办的中国现象学学会的研讨会。本书的有些稿子已在这些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并在听取了与会者的意见后作了修改。我还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陈昕社长的大力支持。

持,使这本小书得以与读者见面。

最后,我想表明,本书不是一本系统化的著作,因为东西文化比较的问题实在太太,作者自感能力不够,条件不具备,无意作系统化的文化比较研究。虽自认为选择了对当代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几个方面进行考察,阐发自己的观点,但完全可能遗留了其他许多重要方面。所以我热忱希望读者能对此批评,纠正我观点之偏颇,补充我思考之不足。

张庆熊

1998年9月于复旦大学哲学系

Ego, Inter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Exchange

(Abstrac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have connected all inhabitants on the earth, while humankind has been experiencing ever so severe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Cultural Exchange of global scope is indeed necessary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However, we can not avoid the problem how is possible to arrive consensus among the people who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are different. This is main question I try to answer in this book. According to my opinion, human beings have the same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inhere in similar life-world, confront together global problems, so that they can share thei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communicate their information, exchange their ideas, and jointly set up new legal and ethical standards. The moral praxes demand the civil people to develop a transcendent spirit, namely to transcend various kinds of selfishness. In view that all main traditions of human's culture encourage the